从“族”到“会”再到“网”：海外华商群体身份建构的概念隐喻机制

王敏*、董维建**
厦门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轻化工大学外语学院

摘要

海外华商身份并非由血缘、国籍或职业等单一要素自然决定，而是在迁移经历、社群组织、商业实践与跨国交往中持续协商和重构的社会认知成果。既有研究多从移民史、文化适应、商帮组织或经济网络解释海外华商的形成与发展，但对不同历史阶段中身份表述所依赖的认知框架及其转换机制讨论不足。本文以概念隐喻理论为核心，结合身份建构与跨国主义研究，对海外华商研究中的口述材料、社团史料和代表性研究文本进行质性文本分析。研究通过语境辨识、基本义—语境义比较、源域—目标域映射和历史语境互证四个步骤，考察“族”“会”“网”三类高频组织意象如何参与海外华商群体身份的建构。研究发现：“族”隐喻以家庭和宗族为源域，突出共同祖源、内外边界、伦理义务与关系信任；“会”隐喻以制度化组织为源域，将身份基础由亲缘、乡缘扩展至章程、职位、公共服务与代表性；“网”隐喻则以节点、连接和流动为源域，强调跨地域协作、信息与资源流通以及多重归属。三者并非前后替代的线性阶段，而是在不同情境中叠加、竞争和重新组合的认知资源。由此，海外华商身份建构呈现出从伦理性归属、组织性成员资格到关系性位置认同的重心移动。本文的贡献在于将华商社群研究中的历史材料与概念隐喻的映射分析结合起来，并对“族—会—网”的线性现代化叙事作出修正。

关键词：海外华商、身份建构、概念隐喻、华人社团、跨国网

* 王敏，现为厦门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 董维建，现为四川轻化工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电邮：dongweijian@suse.edu.cn

From “Clan” to “Association” and then to “Network”: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Mechanism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among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ies

Wang Min[1], Dong Weijian[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m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Abstract

The identity of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ies is not determined solely by ancestry, nationality, or occupation. Rather, it is continually negotiated through migration, community organizatio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transnational interaction. Existing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se communities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igration history, cultural adaptation,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economic networks, while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the cognitive frameworks underlying their identity construction. Drawing on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qualitative textual analysis of oral-history materials, organizational records, and representative studies of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t examines how the metaphors of “clan,” “association,” and “network” structure collective identity through source–target domain mapping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clan” metaphor emphasizes common ancestry, insider–outsider boundaries, ethical obligations, and relational trust. The “association” metaphor extends identity beyond kinship and native-place ties to formal membership, organizational roles, public service, and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The “network” metaphor foregrounds cross-border connections, the circul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and multiple forms of belonging. These metaphors do not represent mutually exclusive historical stages; instead, they coexist, overlap, and are recombined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 study argues that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identity has shifted in emphasis from ethical belonging to organizational membership and relational positioning. It also revises the linear modernization narrative implied by the progression from “clan” to “association” to “network.”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ies, identity construction, conceptual metaphor, Chinese associations, transnational networks

一、引言

海外华商通常指在中国大陆以外从事商业活动、具有华人血缘或文化背景，并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华文化、祖籍社会或华人社群保持联系的商人及企业家群体。与“华侨”“华人”“华裔”等法律或人口学概念不同，“海外华商”首先是一个社会实践范畴：其成员既可能以所在国公民身份参与当地经济，也可能通过商会、会馆、宗亲组织和跨国企业网络与中国及其他地区发生持续联系。因此，海外华商的群体边界并不固定，其身份也不是由血缘、国籍或职业自动赋予，而是在具体交往中被命名、认可和再生产的。

既有研究已从多个层面说明海外华商身份的历史与社会基础。移民史研究关注华人迁移、定居和谋生方式，揭示祖籍联系、殖民制度与地方社会结构对华商形成的影响（庄国土，2001；陈传仁，2007；陈衍德、卞凤奎，2007）。文化适应研究讨论海外华人在宗教、语言与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文化差异和身份张力（朱峰，2009；柴玲，2010）。经济与组织研究则强调宗亲、乡缘、业缘以及信用机制对华商经营和跨国合作的作用（龙登高，1998；刘权、董英华，2003；蒙英华、孔令强，2009）。这些研究为理解海外华商提供了坚实基础，但仍留下一个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海外华商如何借助可感知、可共享的概念框架，把分散的个体经验组织为可被群体接受的身份叙事？

语言并非身份的被动反映，而是身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谈论“自己人”“同乡会”“商会平台”或“全球华商网络”时，不只是描述既有社会事实，也是在选择一种观察群体关系的方式。不同表达会突出某些关系，弱化另一些关系，并由此规定成员资格、道德义务、权力结构和行动边界。概念隐喻理论认为，人们常借助具体经验领域理解抽象概念，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选择性映射能够组织认知并引导行动（Lakoff & Johnson, 1980）。因此，“族”“会”“网”不只是三个历史名词，也可被视为理解海外华商群体的三种认知模型。

本文试图回答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族”“会”“网”分别通过哪些源域结构来理解海外华商身份？第二，这些隐喻如何改变成员边界、信任机制、权威来源和行动方式？第三，三类隐喻之间究竟是线性替代关系，还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共存、叠加并相互转换？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海外华商身份理解为一种由话语、组织和实践共同生成的关系性身份，并通过具体文本片段分析隐喻映射机制。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一）身份建构：从属性认同到互动实践

身份研究已由“个体具有什么属性”逐渐转向“身份如何在互动中被生产”。Berzonsky（2008）把身份形成视为个体处理自我相关信息并作出承诺的认知过程；社会建构取向则强调，身份是在具体语境中通过分类、指称、立场表达和关系协商形成的。Bucholtz 和 Hall（2005）进一步指出，身份不是话语之外的稳定本质，而是在互动中通过相似化与差异化、权威化与去合法化等机制被不断实现。

这一视角尤其适合解释海外华商。海外华商往往同时处于祖籍国、居住国、地方社群、商业组织和跨国家庭等多重关系之中，其身份具有情境性与层次性。同一位企业家在宗亲活动中可以被称为“族亲”，在商会中是“会员”或“会长”，在跨国合作中又成为某一网络的“节点”或“桥梁”。这些称谓所激活的义务、权力和归属并不相同。因而，本文关注的不是哪一种身份“最真实”，而是不同认知框架如何使某种身份在特定情境中获得合理性。

（二）概念隐喻与源域—目标域映射

概念隐喻并非单纯的修辞装饰，而是以一个较为具体、结构清晰的经验领域来组织另一个较为抽象领域的认知机制（Lakoff & Johnson, 1980）。在隐喻映射中，源域的部分结构被投射到目标域，但这种投射具有选择性：它会凸显与当前理解相关的特征，同时遮蔽不符合该框架的内容。例如，把社群理解为“家庭”，容易强调亲密、忠诚和照料，却可能弱化契约、平等与退出权；把社群理解为“网络”，能够突出连接与流动，却可能淡化历史情感和道德责任。

为避免把任何具有比喻色彩的词语都主观认定为概念隐喻，本文参考 Pragglejaz Group（2007）提出的隐喻识别程序（MIP）：首先确定词语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其次考察该词是否具有更基本、更具身体性或物质性的意义；再次判断语境义能否通过与基本义的比较而得到理解；最后在多个文本中归纳相对稳定的概念映射。本文不以词频统计为目的，而是在文本与历史语境互证的基础上解释“族”“会”“网”如何形成系统性的身份认知框架。

（三）资料范围与分析步骤

本文属于理论阐释型的质性文本研究，不以新开展的访谈作为经验基础。分析材料主要包括三类：其一，海外华人移民、家庭与企业研究中已经公开出版的口述或民族志材料，如欧爱玲（2013）关于印度加尔各答客家社群家庭企业的研究；其二，海外华人社团、会馆与商帮研究中的历史材料和组织描述，如刘宏（2003）、李其荣（2017）等关于华人社会转型与跨国联系的研究；其三，直接

讨论海外华商网络概念、构成与功能的代表性论文（龙登高，1998；庄国土，1999；刘权、董英华，2003；张禹东，2006）。这些材料覆盖家庭企业、宗乡组织、商会以及跨国商业联系等不同层面，能够支持三类隐喻之间的比较。

具体分析分为四步。第一，标记文本中与群体归属、成员关系、组织形式和跨地域联系有关的关键词及叙述片段。第二，依据语境义与基本义的差异判断其是否构成隐喻性使用。第三，识别源域的核心结构，并分析其向“海外华商身份”这一目标域映射的对应关系，包括成员边界、信任基础、权威来源、义务结构和空间想象。第四，将隐喻映射放回相关历史与组织情境中，检验其解释力，并特别考察三类隐喻是否存在共存、嵌套或转换。

三、“族”隐喻：以亲缘伦理组织群体边界

（一）源域结构及其映射

“族”的基本经验来自家庭与宗族。其源域结构至少包括共同祖源、血缘亲疏、长幼秩序、内外边界、代际传承和互惠义务。映射到海外华商身份时，共同祖源被理解为共同的中国来源或祖籍地；血缘亲疏转化为宗亲、乡亲和“自己人”的差序关系；家族伦理转化为互助、提携、忠诚与声誉责任；家长或族长的权威则投射为侨领、商界前辈和社群贤达的象征地位。

这种映射并不要求成员之间存在真实的近亲关系。林其锬、吕良弼（2003）所概括的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说明华人社会关系可以沿着“拟亲缘化”的方向延伸。陌生同乡可能借由祖籍、方言和共同仪式被纳入类似家族的道德共同体。宗族隐喻因此不仅提供归属感，也提供低成本的信任机制：当正式制度不足或跨地域交易风险较高时，“同宗”“同乡”成为判断可信度和动员资源的快捷线索。

（二）语料分析：从“兄弟”伦理到“自己人”边界

欧爱玲（2013，页 75）记述，加尔各答一家广东木器公司的兄弟长期诉讼时，当地客家人认为这种做法极不明智，并反问：“所有的兄弟最终都会吵架，但为什么要让外人来插手？”这一片段中，“兄弟—外人”并非普通称谓，而是组织冲突理解的关键范畴。其映射可以表示为：家庭内部争执对应社群内部矛盾，外人介入对应群体边界被突破，兄弟间和解义务对应商业纠纷应优先在内部处理。由此，经济冲突被重新编码为伦理问题，是否维护“家内秩序”成为评价行为正当性的标准。

这一隐喻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强化互助和风险共担，使初到异乡的移民能够借助宗乡关系获得工作、资本与信息；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形成排他

性的内外区隔，使权威过度依赖资历、财富与家族地位，并压缩个体通过公开规则处理纠纷的空间。因此，“族”隐喻不是海外华商身份的原始残余，而是一种在特定制度环境中具有实际效能、同时也包含治理限制的认知资源。

四、“会”隐喻：以组织成员资格重构群体身份

（一）从宗乡纽带到制度化组织

随着移民定居、行业分化和地方社会参与的扩大，仅凭家族与乡缘难以覆盖日益复杂的商业关系。会馆、同乡会、行业公会和现代商会由此成为海外华商的重要组织形式。“会”的基本经验不是血缘共同体，而是具有名称、章程、职位、会费、会议和公共目标的制度化组织。其源域结构包括成员资格、组织层级、规则程序、代表机制、公共服务和集体行动。

当“会”映射到海外华商身份时，归属标准由“出生于何处、属于何族”部分转向“是否加入组织、遵守规则并参与共同事务”；权威来源由长幼与族望转向选举、任命、专业能力和公共贡献；互助方式也从私人性人情往来扩展为法律咨询、市场信息、资源对接、公益慈善和对外代表。身份因而获得了更明确的公共性：个体不再只是某一宗族或乡里的成员，也成为能够以组织名义发声的“会员”“理事”或“会长”。

（二）“会馆”作为空间与制度的双重隐喻

传统会馆首先是可进入、可聚集的物理空间，但在身份叙事中，它同时指向一套制度和关系秩序。建筑的“门”映射为成员边界，厅堂中的座次映射为组织等级，祭祀与庆典映射为共同记忆，议事与捐资映射为公共行动。正因为空间结构、制度结构与文化象征相互叠合，“会馆”能够把原本松散的同乡关系转化为可持续的组织身份。

然而，从“族”到“会”并不意味着亲缘和乡缘消失。许多商会的动员仍以方言、祖籍和熟人信任为基础，组织职位也常由具有声望的企业家担任。更准确地说，“会”是对“族”的制度化重组：它保留情感与伦理资源，同时增加章程、程序和公共服务，使身份从私人关系扩展到组织成员资格。跨国主义研究指出，移民身份由多重归属片段构成，并会随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而变化（Tsai et al., 2000；Vertovec, 2009）。会馆和商会正是容纳这种多重归属的中介组织。

五、“网”隐喻：以连接、流动与位置理解跨国身份

（一）网络源域及其映射机制

“网”的基本结构由节点、连线、路径、中心、边缘与流动构成。与“族”和“会”相比，网络并不预设共同祖源或固定成员资格，而是强调不同主体因关系而形成的结构。海外华商研究对网络的定义虽各有侧重，但普遍把个人、企业、商会、市场与制度之间的持续联系视为核心。刘宏（2003，页 195）将华商网络概括为处于市场与组织之间、由个人和商业机构构成的动态关系；刘权、董英华（2003）强调宗亲、乡土与行业关系的连接作用；张禹东（2006）则指出其本质是以经济联系为主、兼具社会与文化内容的综合网络。

网络源域映射到身份目标域后，个体首先被理解为“节点”，其身份价值取决于连接了哪些人、资源与地区；商业和社团联系被理解为“连线”，信任不再只源于同族或同会，也来自持续互动、专业声誉和关系嵌入；资本、信息、技术与文化被理解为沿路径流动的资源；具有较强中介能力的企业家或商会则被理解为“枢纽”或“桥梁”。在这一框架中，身份不再主要回答“我属于哪个共同体”，而更多回答“我处于何种关系位置、能够连接哪些主体”。

（二）网络身份的开放性与不均衡性

“网”隐喻扩大了海外华商身份的空间尺度。一个企业家可以同时连接居住国市场、中国供应链、第三国投资伙伴和全球华人社团，而无须在这些归属之间作出排他选择。网络因此适合描述全球化条件下多中心、跨地域和可变动的身份形态。王子昌（2013）在评述刘宏的海外华人研究时，正是以区域网络和全球视野说明华人社会研究从单一民族国家框架向跨域关系分析的转变。

但网络也不是天然平等的。节点的连接数量、资源控制和中介位置存在显著差异，中心节点可能掌握信息并设定合作规则，边缘节点则更依赖他者。网络的开放性还可能带来关系的工具化：当共同祖源与组织承诺被弱化时，联系可能随利益变化而迅速中断。因此，网络隐喻虽然凸显灵活性和扩展性，却会遮蔽权力集中、资源不对称和长期责任不足等问题。

表 1：“族—会—网”隐喻的核心映射

隐喻	源域核心结构	成员边界	信任基础	权威来源	身份重心
族	祖源、亲疏、长幼、传承	自己人/外人	血缘、乡缘、伦理声誉	辈分、族望、商业成就	伦理性归属
会	成员、章程、职位、议事	正式或非正式成员资格	组织规则、持续参与	选举、任命、公共贡献	组织性成员资格
网	节点、连线、路径、中心	开放且可变的连接	关系嵌入、专业声誉	资源控制与中介位置	关系性位置

六、从“族—会—网”到“族、会、网”的叠加结构

若把“族”“会”“网”理解为三个依次替代的阶段，容易形成单线现代化叙事：传统宗族被现代社团取代，现代社团又被全球网络超越。然而，历史经验并不支持如此整齐的分期。宗亲与乡缘至今仍是一些商会的动员基础；现代商会通过数字平台建立跨国联系时，又常以“同胞”“一家人”等亲属化语言巩固信任；看似开放的商业网络也可能依托会馆、商会等组织节点运行。三类隐喻因而更接近可被情境化调用的“认知资源库”。

三类隐喻之间存在嵌套关系。第一，“族”可嵌入“会”：宗乡伦理为组织提供初始信任，而章程和职位将其制度化。第二，“会”可嵌入“网”：商会作为集体节点，与政府、企业和其他社团形成跨国连接。第三，“网”又可反向强化“族”：数字媒体使分散的宗亲和同乡重新建立联系，并以共同祖源解释跨地域合作。由此，海外华商身份的变化不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单向替代，而是不同关系逻辑在具体环境中的重新配比。

从身份建构的重心看，三类隐喻确实呈现出可辨识的移动：“族”把身份奠基于伦理性归属，“会”把身份转化为组织性成员资格，“网”则把身份理解为关系性位置。但这种移动只表示某一逻辑在特定时期或场域中更为突出，并不意味着其他逻辑消失。修正后的理论命题可以表述为：海外华商群体身份由亲缘伦理、组织制度与网络关系三种机制共同生成；社会环境变化所改变的，是三种机制的相对权重及其组合方式。

七、国际传播的理论含义：从代表群体到关系中介

海外华商常被描述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若仅把这一表达作为政策口号，便难以说明其实现条件。前文分析表明，传播能力并不直接来自华人血缘，

而来自三类身份机制的共同作用：宗乡伦理提供情感可信度，商会社团提供组织代表性，跨国网络提供信息触达与资源转换能力。只有当三者形成有效配合时，海外华商才可能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的关系中介。

“族”逻辑有助于维系文化记忆，但若过度强调单一祖源，可能强化内外边界，不利于与当地社会形成平等对话；“会”逻辑能够通过公开活动、公益服务和制度化合作提升传播的公共性，但组织代表性必须建立在透明治理与广泛参与之上；“网”逻辑能够跨越地域传播信息，却也容易受商业利益、平台结构和信息失真的影响。因此，有效的国际传播不应把海外华商预设为同质化的“天然传播者”，而应关注其在具体组织与网络中的位置、信誉和受众关系。

从理论上说，“桥梁”本身也是一种隐喻：它强调两端之间的连接，却可能把海外华商简化为被动通道。相比之下，“关系中介”更能体现其主动选择、意义翻译和利益协调能力。海外华商既可能传播中国经验，也会把居住国社会的制度、需求与评价反馈给中国。传播因此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多主体之间的协商过程。

八、结论

本文从概念隐喻理论出发，分析了“族”“会”“网”三种认知框架如何参与海外华商群体身份建构。“族”以家庭和宗族经验为源域，把共同祖源、亲疏秩序、伦理义务和内外边界映射到华商社群；“会”以制度化组织为源域，将成员资格、章程程序、职位分工和公共服务映射到群体身份；“网”则以节点、连接和流动为源域，把身份理解为个体或组织在跨国关系结构中的位置。

研究进一步指出，三类隐喻不是严格的历史阶段，也不是彼此排斥的类型。它们在现实中相互嵌套：亲缘伦理能够支撑商会社团，商会社团又可成为跨国网络的节点，数字网络还会重新激活宗乡认同。海外华商身份由此表现为伦理性归属、组织性成员资格与关系性位置的复合结构。相较于线性演进叙事，这一解释更能容纳不同国家、行业和代际之间的差异。

本文的局限在于，所用材料主要来自公开出版的研究文本与二手口述材料，尚未建立跨地区、可比较的原始访谈语料库。后续研究可选择东南亚、北美和欧洲的不同华商组织，按照统一访谈提纲收集成员叙事，并比较不同代际、行业及组织职位对隐喻选择的影响；亦可结合语料库方法考察“家”“会”“平台”“网络”“桥梁”等关键词在不同时期的共现关系。这样的研究将进一步检验本文提出的叠加结构，并推动海外华商身份研究由理论构想走向可重复的经验分析。

参考文献

柴玲（2010）。论海外华人的中国认同。*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7*（1），67-76。
陈传仁（2007）。《海外华人的力量：移民的历史与现状》。世界知识出版社。
陈衍德、卞凤奎（2007）。《闽南海外移民与华侨华人》。福建人民出版社。
李其荣（2017）。《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林其锬、吕良弼（2003）。《五缘文化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
刘宏（2003）。《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大学出版社。
刘权、董英华（2003）。海外华商网络的深入研究及资源利用。*东南亚纵横*，（7），59-62。
龙登高（1998）。论海外华商网络。*当代亚太*，（4），55-59。
蒙英华、孔令强（2009）。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华商网络：文献评述。*东南亚纵横*，（12），92-97。
欧爱玲（2013）。《血汗和麻将：一个海外华人社区的家庭与企业》（吴元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子昌（2013）。网络视野下的华侨华人：刘宏及其海外华人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8），13-20。
张禹东（2006）。海外华商网络的构成与特征。*社会科学*，（3），106-111。
朱峰（2009）。《基督教与海外华人的文化适应：近代东南亚华人移民社区的个案研究》。中华书局。
庄国土（1999）。论早期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形成——海外华商网络系列研究之一。*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7-35。
庄国土（2001）。海贸与移民互动：17—18 世纪闽南人移民海外原因分析——以闽南人移民台湾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28-41。
Berzonsky, M. D. (2008). Identity formation: The role of identity processing styl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4*(3), 645–655.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07.09.024
Bucholtz, M., & Hall, K. (2005). Identity and interaction: A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 *Discourse Studies, 7*(4–5), 585–614. https://doi.org/10.1177/1461445605054407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ragglejaz Group. (2007). MIP: A method for identifying metaphorically used words in discourse. *Metaphor and Symbol, 22*(1), 1–39. https://doi.org/10.1080/10926480709336752
Tsai, J. L., Ying, Y.-W., & Lee, P. A. (2000). The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and “being American”: Variation among Chinese American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1*(3), 302–332. https://doi.org/10.1177/0022022100031003002
Vertovec, S. (2009). *Transnationalism*. Routledge.